

历史就是再表述

——兼论民族、历史与国家叙事

徐新建

摘要:本文提出“历史也是文学”并从文学和人类学角度探讨关于中国的历史表述,主要观点有:1)在包括文字和口头的表述意义上,历史属于广义的文学;2)有关古今中国的历史表述可由文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研究;3)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共同体,对其历史的表述需要具有多元对话的视野方能接近完整,因此不但要对汉学加以了解,同时还应开展兼容藏学、满族学、蒙古学和苗学、彝学等的交流对话。

关键词:中国历史; 表述; 文学人类学

作者简介: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多民族国家文化研究。电子邮箱:scxxjian@sina.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批准号:11ZD&10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istory as Re-representation: With Reference to Nation, History and Narrative of the State

Abstract: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history is also literature, and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e paper argues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prepositions. In terms of literary and oral representation, history belongs to literature in the broad sense. All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history can be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Since China is a multi-nation stat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its history require a vision of pluralist dialogue, and this asks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sinology while the dialogue should extend to the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studies of the ethnic nationalities such as the Tibetan, the Manchu, the Mongol, the Miao and the Yi.

Key words: Chinese history; representation; literary anthropology

Author: Xu Xinjian is a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states with multi-nation cultures. Email: scxxjian@sina.com

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源远流长。在汉语世界,自古便有司马迁“文史不分”式的书写传统,近代以后虽受到西学东渐引起的学科划分缠绕,学界对文史哲相通的强调始终未断。在我看来,促使文史关联的核心乃在叙事和表述。

作为人类文化的普遍现象,表述问题几乎关涉所有学科,意义和范围不仅限于通常认为的想象性领域,如文学和艺术;对于所谓纪实性的史学而言,也非例外。^①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界在关注

历史叙事性特征的同时,也将时间空间化(异域化、他者化),提出“历史就是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②在表述意义上,我想说:“历史也是文学”,由此强调历史的性质是故事(stories)及通过讲述再现以往的事实;简言之:历史就是再表述。所以,就像人类学以民族志方式所作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描写一样,历史(history)既然可视作对人类社会的历时性表述,其本身便已成了文学研究对象。这样的观点在西方当代文论的“新

历史主义”思潮中已有论述。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强调表述就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则指出:后人找不到历史本身,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这些叙述充满想象和加工,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为此需要使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在元历史的理论构架中回归叙述(160-79)。

这就是说,我们阅读历史,关注的不仅是故事转述的人物和事件,更包括被讲述者(史学家)所做的舍弃和改编,也即关注过去的事实如何在“历史”中被凸显或被遗弃。结合中国的历史叙事领域,值得讨论的话题很多。目前最需要研究的,是被称为“中国历史”的故事如何在不同时代被不同学者表述出来,并通过不同渠道在社会传播和接受。因此,我所关心的话题,便是汉语书写的历史如何“表述中国”。本文结合王明珂先生几部有关华夏边缘的著作展开讨论。议题包括“历史”、“中国”和“表述”,合起来就是“被表述的历史中国”或“表述的中国历史”。

一、“历史表述”的功用和类型

对于该如何表述“历史中国”,前人已说得不少。王明珂的著作再次提起,突出了史实、史学和心性的区分,从而在根本处引出对“史学学”和“史学史”的重新讨论。^④在2001年发表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一文里,王明珂强调在将文献与口述史视为“历史记忆”的前提下,人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后者的意思是指该记忆“所循的选材与叙事模式”(王明珂,“历史事实”137-47)。以近代以来学界对羌族历史的多种表述为例,王明珂认为应解构其中的某些类型,如“羌族被打败、西迁,然后一部分变成汉族、一部分变成藏族、一部分变成西南民族”那样的历史;同时提出自己的另外建构,即羌人如何“作为中国人眼中的一个西方异族”而“随着华夏的扩张慢慢往西方飘移”。王明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国族建构’里,很明显地,历史学是走在前面的。先建立一个国族历史,然后再去找民族学、体质学、语言学等等证据来支持它”(转引自顾坤惠551-72)。

这就是说,无论何种主张和类型,有关中国的

历史都是因不同需要而被人为建构起来的。王明珂的目标是结合“历史民族志”和现实关怀的学术书写来对中国的历史表述重新建构。对此,沈松桥评价说,其作用是“对中文学界的历史学者跟人类学者,在共同思考怎么样突破双方的学科界线、怎么样彼此借镜这样的工作上,竖立了良好的典范”(转引自顾坤惠551-72)。在我看来,此种跨界所涉及的学科,不仅限于史学和人类学,而已跨入了广义的文学。在对族群文化的表述上,三者以各自的标志性作品形成可相互解读的彼此关联,那就是: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文学。举例来说,在同样表述西南地区藏、羌、和汉民族相互关联的作品中,无论冉光荣和李绍明等著的《羌族史》、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还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及汉藏文版的《墨尔多神山志》,都可视为不同文体和文类的历史叙事。在对过去事实的重新表述上,它们的性质一样,区别只在于作者自认或被认为分别选择了史学、民族志或小说的方式,以及各自偏重的问题和立场不同而已。

不过,若要深入讨论不同文类在重塑历史时的联系和区别的话,还需回到更为基本的问题起点,重新解答对“历史表述”及其不同类型的认识和界定。让我们把目光返回到近代。有意思的是,晚清以来,类似的讨论在史学界同样热烈。

章学诚结合中国古代情况,把史学分为两大宗,一为“记注”,一为“撰述”,谓:“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13)。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凸显了史学从业者的主体意义;而“藏往”与“知来”的二分梳理,明确道出了历史表述的两个基本面向。

李长之把司马迁同时看作是文学家和史学家,然后从孔子说起,指出《春秋》与《史记》为同类,均不是“实然”史实的记录,而是对“应然”理想的发挥。对于司马迁之难能可贵,李长之认为“尤在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并又指出司马迁憧憬于以《史记》继《春秋》,“志在孔子”如其之“志在周公”(176-77)。^⑤这后一种评价亦很重要。多年以后,刘小枫在对司马迁的论述中做了再度发挥。^⑥

王明珂的著作以华夷关系为轴心,辨析不同的族群叙事,在由古而今的文本中分出“英雄祖先历史”与“弟兄祖先故事”类型,指出虽然二者

代表的历史心性有别,却可合称为关于中国历史的“根基模式”。这样,王的重点同样置于历史写作,关注表述者的用意和立场,讨论特定的历史文本及其相应情景间的互动关联。此类讨论有一个突出意义,就是揭开“历史”的面纱,把读者的目光从史实引回文本,关心并思考历史如何和为何被表述。这样便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史学重建连在了一起。

清末民初,梁启超发动史学革命,鼓动创立“新史学”,理由是其能够激励中国国民的“爱国之心”、团结“合群之力”,继而“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梁启超 6)。作为后来的响应者之一,胡适以“国学”为中心,发表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曰:

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从江浙到湖广,从湖广直到云贵[……]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9)

与此不同,顾颉刚则提出“四个打破”,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时代的观念。顾要反对的是大一统叙事。他指出:

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⑦(105)

顾颉刚依照自己提出的古史“层累说”观点,强调了不同时代之学者对历史的持续制造,认为在此过程中不但有着显著的纵向影响,而且形成表述上的故事递进:“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了许多古皇帝”(顾颉刚 75-79)。

如今,这样的问题是否完结了呢?显然没有。历史的书写面临再次更新。转用王明珂的说法,今天的史学需要在新情境中重叙(续)文本。⑧

二、“中国历史”的关联与演变

康熙年间,湖南人曾静不满清廷统治,著《知新录》,谓“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又说“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79)。到了雍正帝当朝,曾静遭查办,罪名是反清犯上,离间华夷。对此,雍正帝令将此案关涉的前后谕旨及曾静等人口供汇编成书,取名《大义觉迷录》,广布天下,以戒臣民。雍正帝说:

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转引自 沈云龙 3)

曾静被捕后招供认罪,承认不该“以地之远近”而应“以人之善恶”分华夷、别人兽,最后在狱中写下悔过书,叩认了大清王朝的正统与合法,从而被免一死。其悔过书名为《归仁说》,曰:“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转引自 沈云龙 482;507)。⑨

后来乾隆帝即位,依然关注华夷问题,先是将曾静等人重新问罪(凌迟处死),再调集力量编纂《满洲源流考》与《大清一统志》等官书,以图“顺古今沿革”且“垂信千古”。《满洲源流考》以“部族”为首,分述了疆域、山川和国俗四个方面。编纂之初,皇上下谕,称其目的在于“昭传信而辟群惑”,故特就“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为一书”,以“乘示天下万世”。后人有的认为该书是朝廷“为了要替皇家族号正名,所行的考证之作”(王俊中 95)。有的则认为,其目的旨在“追溯满族从姓氏到种族之源流如何地与汉族不同”(王汎森 10),也就是强调“华夷之辨”。

这些案子、官书以及皇上旨意和士绅命运,均是记录存档的历史事件。它们同样与“华蛮之

辨”和“族群交往”等有关,却不能等同于仅刻画在纸上的文本书写。对这样的史实进行讨论,有别于对演变为史学作品后的文类区分;相反,是把人物、事件及其相关过程看作整体的“社会文本”,继而揭示其中的依存关系或内在缘由。

例如,通过梳理《大义觉迷录》的产生、演变,史景迁发现在雍正帝与曾静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身上,隐含着一条历史暗线,即“17世纪中叶明朝被清朝征服之际,军事和思想战线上的纠纷与斗争”;究其根源,则还可追溯到孔子时代的古老哲学和经典文献之中的“华夷之辨”源流(史景迁3-7)。而另一位史学家柯娇燕,在借助对包括《满洲源流考》等官书在内的清朝文献分析之后,看到的是“满洲人”的民族认同对清统治者十分重要,但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变异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作出了特有的创建。柯娇燕指出:

他们从蒙古人那里获得了世界帝国继承者的资格,并取得了统治合法性的部分宗教支持;从满洲旗人那里获得了领导征服战争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从汉人那里获得了在中国进行合法统治的官僚统治的技能和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取得了对朝鲜和越南进行统治的道德领导权;从藏人那里获得了作为普世的佛教领袖的超自然的权力。(转引自 孙静 246-47)

面对这样的状况,值得深究的问题出现了:何谓“中国”?“华夏”和“蛮夷”的意味是什么?每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之后,该如何表述多民族轮替的帝国演变?如果说曾静案表现出华夷关系的紧张与整合,《满洲源流考》与《大清一统志》则标志着入主中原的“外族”对“中国”的拓展和再造。这时,如若仍只将那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重大事件视为文字表述的“情景”是不够的。回到大清统治下的西南。就在“华夏边缘”的“弟兄族群”以文本方式对中原“英雄祖先”加以“攀附”的先后时期,赵尔丰、鄂尔泰等朝廷将领便已奉朝廷旨意,通过军事征剿、文化教化等手段在藏区和苗疆等处“改土归流”,实质性地把《大清一统志》等所内涵的帝国意识逐一落实到往昔的边疆蛮地了。

三、跨族群叙事:史实和史记

我们讨论“中国历史”及其诸种表述,不得不同时兼顾史实和史记(史学)两面。夏、商、周的纵横交替是历史,孔子编纂《春秋》是史记;从秦皇到汉武的改朝换代是历史,到太史公奋笔撰书“五帝本纪”、“西南夷列传”是史记;曾静与雍正帝合演的“华夷之争”及“满汉融合”是历史,《大义觉迷录》都是史记。再后来,由史景迁续写《皇帝与秀才》乃至二月河等创作《雍正王朝》之类的电视剧又属于哪一类呢?回答是:既是史实也是史记。其实说白了,所有后面的一类也都如此,即都具有史学和史实的双重性:在表述中国的意义上是史记,或广义文学;而从社会实践的层面看又无一不是史实。

不过如若细分起来,作为表述中国的历史类型,上述列举的事例中,前一类是事情的历程,堪称为“史实史”;后一类是对事情的再叙,连接着“史述史”。而且这后一类型的诉说本身,又从另外的路径构成并融入到可同样被再叙的历史进程之中。诚如当年太史公父子生死交接时所言,太史之命,在国为忠,在己为孝。何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道之大者!”(司马迁 3295)。在这意义上,“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延伸和对话。于个人可为事功,于政治是治国经验,于文化是族群传统,于学术则在思想呈现和发扬。

但是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延续面临表述危机。这危机分别覆盖由“历史”关涉的个人事功、政治实践以及文化传统和学术呈现诸面向。从史学的学理上说,历史的存在需以空间的广延和时间的连续为前提。但作为事实的“历史中国”过去了,作为言说的“中国历史”尚在重建中。于是究竟该如何划定“中国”的空间广延与时间连接并由此说明其中的族群联系,却是仍处在争论中的悬念。这既是对过去的承继,是现在的事件,同时还将是未来的论题。

与此关联,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将面对一系列关键性追问,比如:有没有一个同质的“古代”?有没有一个一统的“国族”?对于多民族构成的历史互动,该选择什么样的标志和结构来表征?无论回答如何,我以为都有一个值得深入的话题,

即如何处理与“中国”相关的前后两个“三代”，一是早期的夏、商、周，一是晚近的元、明、清。二者共同指向多元视角，需要包容不同的族群、地域和文化主体——有夏，有商，也有周，还有与此同时的四方之民；从元、从明，也从清，乃至延伸到华夏和四夷。它们的关系是既互为中心，又互为边缘。

小 结

本文的讨论从史实、史记到史学和文学，由四方到中原，再对比东北与西南并连接古代帝国与现代国家，意在阐释多民族王朝与国家的历史表述。通过分析王明珂等的相关著作及关注历史文本与情景的关联，不仅使旧话重提而且欲将近代与古代打通，把问题又一次由“国族”反思引回“国史”再造。不过需要明白的是，我们的讨论面对两个既关联又不同的历史：一是国事的发生，另一是对国事的书写。二者相加才构成“国史”的整体。

乾隆年间，多族并存。一方面有政治利益冲突，一方面也有文化传统延续。在《满洲源流考》编纂之际，绍兴人章学诚撰写了至今流传的《文史通义》，强调“六经皆史”、“即器明道”，对史学要义作了三分，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⑥。进入民国后，苗族学者杨汉先、梁聚五等打破“五族共和”的狭隘划分，呼吁在汉、满、蒙、回、藏的格局之外恢复苗夷民族的历史地位^⑦，从而引发了欲与“五帝本纪”相并列的“蚩尤叙事”等另类表述^⑧。若我们重论“国史”，不仅要关注文学（虚构）与史学（记实）之间的“表述循环”，还应兼顾不同表述者的所凭、所具和所贵，并且再包容汉学与藏学、满学以及苗学、蒙古学等相关表述间的交融和对话。

进而论之，在中西古今的学理汇通上，如果说当代西方文论兴起的“新历史主义”以倡导“文化诗学”而使文学文本从形式主义批评的陷阱中提拔出来，重归历史语境的厚重诠释的话，本文强调对历史文本的表述分析，则选择了另外一条对应路线，也就是把历史视为文学或文学式的另一种叙事，从而希望不仅扩展文学（literature）及历史（history）的分类意涵，而且还期待以此为工具，深入到对貌似客观自在的各种历史表述从文本到作者的深入剖析和解读之中，就像多年以来文学批

评界对自屈原、李白到莎士比亚、狄更斯和鲁迅、马尔克斯及其各自作品早已做过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再表述。

注释 [Notes]

① 参见徐新建“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2011）：149-54；安琪“史学、文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的叙事与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2010）：8-14。

② See Lowenthal, Davi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参见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汉译本），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6-17。在该书里，representation被译为“表征”，我认为从其包含了从语词、言说符号到实践等更为广泛的意指来看，译为“表述”更恰当。

④ 王明珂的著作最初多在台北出版，其中一些在2000年后陆续引进到大陆，主要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⑤ 关于李长之对司马迁论述的评价，可参见张桂萍“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史识——读李长之《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古典文学知识》1（2008）：71-79。作者指出，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是艺术家的理由，“更多意义上是就其表述上的成就而言”。因此才得出结论说“司马迁的历史意识佐之以诗人的慧眼，使《史记》表现出史诗性”。作者进而认为李长之的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文学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启发性的。”

⑥ 参见刘小枫“司马迁属什么‘家’？”，《读书》8（2003）：39-44。

⑦ 类似的话顾颉刚还说过不少，如“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战国、秦汉时的人们）[……]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种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民族主义。本来楚的祖是祝融，到这时改为帝高阳（后人说他就是颛顼了）”，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9-82。

⑧ 参见徐杰舜、王明珂“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4（2004）：65-74。

⑨ 相关讨论可参见笔者“帝国轮替中的认同演变”一文，《淮北师范大学学报》4（2011）：4-5。

⑩ 参见杨汉先《苗族述略》（1937），收入张永国等编《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阳：贵州民族研究所，1983年）。

张兆和认为通过探讨民国年间西南少数民族裔的自身表述,可了解“在与以汉族主导的现代国族建构中”他们对族群身份和边界问题的立场。杨汉先的例子体现出“土著”精英对政府主导之国族建构计划的反应。参见张兆和“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族群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3(2010):1-11。

① 参见徐新建“‘蚩尤’和‘黄帝’:族源故事再检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5(2008):2-13。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Gu, Jiegang.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顾坤惠:“‘历史人类学工作坊’会议摘录《羌在汉藏之间》发表与评论会”,《清华学报》34.2(2004):551-72。
[Gu, Kunhui. “A Workshop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 Launch of Jiang Nationality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34. 2 (2004):551-72.]
-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上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Hu'nan Province Local Chronicles Committee, eds. *Hu, nan Province Local Chronicles*. Vol. 30. *The People*. Book I. Changsha: Hu, nan Education Press, 1992.]
-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Hu, Shi. *A History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Li, Changzhi. *The Personality and Style of Sima Qi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Liang, Qichao. *New Historiography. Collected Works from Yinbing Studio*. Vol. 9.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Shen, Yunlong, ed. *Collected Papers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No. 36. Taipei: Wenhai Publishing House, 1966.]
-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eat Histor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 史景迁:《皇帝和秀才》,邱辛晔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Spence, Jonathan. *Treason by the Book*. Trans. Qiu Xinye.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 2005.]
- 孙静:“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介”,《清史译丛》第3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Sun, Jing. “A Review of Pamela Kyle Crossley’s Manchu Study.” *Translations on the Study of Qing-Dynasty History*. No. 3. Beijing: China Re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王汎森:“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大陆杂志》4(1992):1-20。
[Wang, Fansen. “Pre-18th Century Social Mentality as Reflected in the Case of Zeng Jing.” *The Mainland Magazine* 4 (1992):1-20.]
- 王俊中:“‘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89-132。
[Wang, Junzho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churia’ and ‘Manju’ and the Leaders in Tibetan Thought of the State and Religion.” *The Collected Pap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8(1997):89-132.]
-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5(2001):137-47。
[Wang, Mingke.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Disposition.” *History Research* 5(2001):137-47.]
-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White, Hayden.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New Historic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d. Zhang Jingyu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章学诚:《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Zhang, Xuecheng. *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责任编辑:王峰)